



好 读 书 读 好 书

张新颖近日在推出《沈从文的前半生》的同时，对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进行了必要的修订。自此，张新颖笔下的沈从文人生终于“圆满”，其笔下的沈从文形象也终以完整、丰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这两部作品内容翔实、全面，考证严肃，证据可信，是全面研究沈从文心理历程和创作思路的重要著述。

张新颖将沈从文的前后半生的人生节点确定为1948年，这年沈从文已经46岁。严格意义上讲，三年前他已经迈过了前半生的人生门槛。但很少有人像沈从文这样，人生中有这般鲜明的分野，这大抵是张新颖以1948年为沈从文人生前后半生分界点的原因所在。

沈从文的转向，在前半生就已埋下伏线

□禾刀

前半生的「饥饿」

沈从文一生创作过80多部文学作品，曾有文章称他“极有希望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如果这是事实，那也是对他1948年前文学成就的肯定。此后他虽然也创作过《老同志》和《中队部》等文学作品，但他努力创作的这些应景文章均未能发表，反倒“发表的与历史文物、民族艺术相关的文章不少”，这足证“他的文学遭遇了新兴文学的挑战”。

许多人只知道沈从文的文学成就，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，沈从文并非天生就是一位对文字敏感的文学青年，从小也没表现出这方面的特别天赋，走上文学道路，更像是被生活所迫。

1917年7月16日，因为家境也因为百无聊赖，沈从文跟着本地军官杨再春进入部队。人生此时可以说是白纸一张，也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，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。至1924年8月决定前往北京求学前，虽然这段时间沈从文或多或少从事一些与文化有关的工作，偶尔对文学作品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，后期对器物鉴赏也有爱好，但更多时候沈从文因疲于解决肚子饥饿问题，而不得不四处奔波，见识了太多的人头落地，甚至有点见惯不怪。

好男儿志在四方。大道理很好懂，也极易激发起年轻人的勃勃雄心，不过，一旦离开父母，远走他乡，再宏伟的志向，也得有赖于基本生存问题的破解。这也是沈从文来到北京后，首先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。沈从文拼命写作，一开始并不是真就因为创作欲望强烈到无法自制，反倒是他的生活太过窘迫，几乎陷入绝望的边缘——性格过于内向，注定他在北京这个陌生的地方不太可能找到像样的工作，码字的好处是可以免去与他人交流的烦恼。

沈从文开始进入文学道路时至少有两大“贵人”不可或缺，即郁达夫和徐志摩。徐志摩对他的写作帮助最大，郁达夫则给了他坚持创作的希望。郁达夫不仅请极度饥饿的沈从文吃了顿饱饭，还将剩下的钱留给了他，更重要的是他鼓励沈从文继续写下去。一盏原本微弱即将熄灭的灯，就这样被重新点燃。

“历史”有着惊人的相

似。1932年，被未婚夫抛弃的萧红挺着大肚子困于哈尔滨的旅店。万念俱灰之时，萧军出现在她的眼前。如果不是萧军，中国近代文坛很可能失去一颗璀璨的新星。不难看出，无论是后来的萧红还是1924年的沈从文，在尚未迈入文学门槛之时，饥饿问题如影随形，文学更大程度上只是他们求生的一根救命稻草。或许可以依此类推，那个年代也许有更多年轻人遭遇过他们这样相同的经历，只是因为后来没能走上文学道路，抑或在文学方面无甚建树，自然未能载入文学史册，毕竟历史更喜欢眷顾名人。

张新颖在本书中一再强调沈从文的“饥饿”状态，这并不会抵消掉沈从文的文学光芒，只会让读者看到一个更加平实、更加可信的沈从文形象。事实上，后来驶上文学创作快车道上的沈从文，饥饿问题虽然有所缓解，但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，哪怕是后来在胡适的帮助下，有了教师这样相对稳定的职业。肉体的“饥饿感”不再令他绝望，而文学上的“饥饿”感却迅速发酵。

沈从文终于表现出强烈的创作欲望，强烈到几乎不管不顾的地步。长期以来，对他的各类批评络绎不绝，有的甚至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，比如因为没有正式学历，他在应聘时屡屡遭到学历歧视，刘文典甚至当面讥讽他。作为一个内向而又敏感的人，沈从文对这些鲜见激烈的反应，至少从各方面的文字记载看不出明显的痕迹来。

有趣的是，面对对他作品的批评，他常常表现得极为“亢奋”，甚至像勇士一样积极“应战”，哪怕论战对象是鲁迅这样的名人。当然，沈从文的“交锋”并不是出于意气，而是基于文学本身。某种意义上，这样的批评越多，他的创作“饥饿感”越发强烈。如果说肉体的“饥饿感”迫使沈从文开始码字糊口，那么创作的“饥饿感”则驱使他文学的道路上越耕越勤，越耕越深。

如此看来，沈从文并非一个畏惧批评的人。他甚至乐于论战，但前提必须是基于文学。这大抵是沈从文前半生笔耕不辍的原因所在吧。



一九三八年，沈从文在昆明

后半生的「转向」

1948年暑期，在同二子“虎虎”的一次对话中，沈从文兴致勃勃地表示，为追赶俄国文豪托尔斯泰，“一定要努力”，再“写个一二十本”。此时，内战正酣，沈从文对导致民族命运大悲剧的政治越来越绝望，被郭沫若批判为“桃红色文学”的代表，更直接决定了他此后被边缘被批判的命运。他深深感到了悲剧性的宿命，他最终的选择是切脉自杀，幸而被及时发现。

1949年1月，沈从文写道：“若勉强附和，奴颜苟安，这么乐观有什么用？”（见季羨林《悼念沈从文先生》）。自杀事件平息之后，沈从文毅然割断了赖以成名的传统文学情结，一头扎进文物历史研究工作，从“悲剧转入谧静”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作为一个受文学熏陶多年并颇富成就的作家，沈从文心底绝不会否认文学和文字的意义。但出于对他人、家人和自己的必要保护，沈从文除了努力争取一点自保希望别无他法，尽管这样可能损及此前呕心沥血积攒起来的文学声誉。或正因这些谨慎，老迈之年虽历经磨难，但沈从文总算得以苟且偷生。而同样遭遇的老舍先生投向了未名湖，以悲剧收场的文化名人还有吴晗、邓拓、傅雷夫妇、翦伯赞、杨朔等。

自杀事件后，沈从文“由艺术与文化的理想出发，落实到了历史文物方面的具体事情”。从书中难以寻觅沈从文这种转向的学术动机，但与文学创作面临的风险相比，这种转向可能更为保险，并有先验可循，比如郭沫若就曾凭借《甲骨文研究》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。

不过，恐惧归恐惧，隐藏在心底的那些文学情结怎能不“蠢蠢欲动”。1950年后他先后创作过《老同志》和《中队部》，也写过一些应景诗，然而，这类既不能真正割断传统文学血脉，又无法真正对接新兴文学的作品，难免两头不讨好。好在沈从文因此增添了一层层保护膜，哪怕薄如蝉翼。

在沈从文的后半生里，更多“作品”是那些应付各类批斗的检查。“从1966年7月到1968年12月，他就做过六十多次检查”，“共被抄家八次”，直到最后实在抄无可抄。接下来又被发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，研究工作停摆。沈从文的作品和个人变得更加敏感，连原来

抢着出版其作品的出版社因规避风险也不得不撤销计划。

他不仅自己敏于写传统小说，面对那些频频登门虚心请教写作乃至写字之辈也均冷言相劝，连“徐州师范学院《中国现代作家传略》编辑组请他提供自传稿”也被他“谦虚”地拒绝。他努力与自己的前半生进行切割。

与国内视沈从文作品为“牛鬼蛇神”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在海外，其作品逐渐走热，不仅在欧美日多个国家相继推出，关于沈从文作品乃至个人的研究著作亦纷纷面世。可谁又能料到，当研究这位老人和其作品正上升为一门学问时，主角却深陷人生困局。某种意义上，这种“外火”，也会进一步加大沈从文精神上的负荷。相较而言，没有什么政治风险的学术研究，不仅可以使沈从文免去诸多干扰，同时也是他缓解压力的重要精神出口。

笔者注意到，类似以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为个人研究界限的著作近年来并不鲜见，比如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《梁漱溟的最后39年》《马寅初的最后33年》《顾准的最后25年》《傅雷的最后17年》《丁玲的最后37年》……

一般情况下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，并不会有过太鲜明的前半生与后半生分野，也鲜有像沈从文“切脉自杀”这样的标志性事件，之所以后半生（或同一历史时间界限）成为一种模式化研究，因这种时间区间里所发生的诸多事件，与前半生有着鲜明的差别。当然，这些区别往往与前半生的主动努力奋斗截然不同，更多时候只是疲于应对突然而至的恐惧，有的因无法承受于是草草了结性命。

沈从文在煎熬中最终走出了饥饿，也走出了时代的悲剧。恢复了声誉的沈从文，其文学和学术地位均得到应有的认可。然而，此时他年事已高，虽多年投入文物历史研究亦富成就，但《边城》的那种创作激情早就被岁月打磨光圆。况且岁月不饶人，后半生他还深陷高血压的肉体折磨。

记得曾有人讲过，苦难出文学，但如果苦难超出了常人的承受范围，别奢谈创作，坚韧求生兴许才是最大的命题。比如后半生里的沈从文，以及有过同样经历或消逝于那个年代的诸多文人。



《沈从文的前半生:1902-1948》张新颖 著 上海三联书店



《沈从文的后半生:1948-1988》(增订版)张新颖 著 上海三联书店

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
设计：壹纸工作室
本版编辑：曲鹏
美编：马晓迪